

美国的朝贡体系*

邝云峰◎

【内容提要】 朝贡体系通常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阐释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既有的分析框架所不具备的真知灼见。本文认为，美国创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朝贡体系。作为有史以来所建立的最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盟网络的轮轴或中心，美国向其盟友和伙伴——或朝贡国——提供军事保护及经济上的市场准入。作为这些努力的回报，美国直接寻求的贡品一方面是它被承认是唯一的强权或霸主，另一方面则是其他国家效仿其政治形态和理念。掌握着这两种贡品的美国泰然自若，至少从美国的角度看，它和世界都是安全的。

【关键词】 朝贡体系 等级 不平等

美 国与中国之间有着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多的共同点。在本文中，笔者将运用朝贡体系这一通常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理念来阐述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美国

* 感谢卡瑞娜·康 (Karina Kan)、本杰明·马希尔 (Benjamin Martill)、尼古拉·霍斯伯勒 (Nicola Horsburgh)、朱利安·格鲁恩 (Julian Gruin) 和法里斯·阿里汉 (Faris Alikhan) 提供的研究协助，同时对何英成 (Eng Seng Ho)、李福源 (Hock Guan Lee)、罗斯玛丽·福特 (Rosemary Foot)、安德鲁·哈雷尔 (Andrew Hurrell)、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对本文初稿的评论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深表谢意。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总第36期），第36—88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创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朝贡体系。作为有史以来所建立的最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盟网络的轮轴或中心，美国向其盟友和伙伴——或朝贡国——提供军事保护及经济上的市场准入。^① 通过一系列同样了不起的国际制度和组织（其中许多由美国所建立），美国传递和强加着自己的价值观以及自己所偏爱的国际体系中的游戏规则。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秩序”被构造为一个仁慈的美国霸权所提供的“公益”。作为对所有这些努力的回报，美国所寻求的贡品直截了当：一方面，它被承认是唯一的强权或霸主；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效仿其政治形态和理念。掌握着这两种贡品的美国泰然自若，至少从美国的角度看，它和世界都是安全的。

下文将详细阐述这些论点，并且提供初步证据来支撑这些论点。文章将首先讨论并批评当前有关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解读，主要关注美利坚帝国、美国是一个单极强权以及美国是一个附庸国体系的首要庇护者等主张。笔者认为，尽管这些主张说明了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某些重要方面，但是它们未能强调美国作为霸主为自己的努力所希望获得的回报。这为引入朝贡体系的理念铺平了道路，这一思想以等级制为出发点，但是强调了既有论述所忽视的两方面卓见：美国希望被朝贡国认可为第一强国，并且希望它们采纳（美式）自由民主规范和制度。其次，文章讨论了中国的朝贡体系，关注其六项关键特征。再次，文章还将论证这些特征与美国在 1898 年以后对待世界的方式有怎样的相似之处。中国与美国的朝贡体系之间的差异也将进行讨论。最后，文章结论部分说明了从朝贡视角看待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经验和理论启示。

一 描绘美国

“山巅之城” “第一个新国家” “充满希望的大陆” “特有的远见卓

^① 朝贡国、二流国家、附属国和藩属国等词汇经常被用来描绘那些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遵循必要的外交礼仪以及进行贸易的国家。就本文的目的而言，笔者倾向于交替使用前两个词汇——朝贡国和二流国家。

识”“不可或缺的国家”：^①这些是一部分历史悠久并传承至今的对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描述。其共同的主题就是特殊性，即美国在历史、意识形态和地理上有别于其他所有国家。从华盛顿提出的不要追随欧洲人卷入联盟的警告，到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的不要寻找外部敌人去战斗的格言，美国建国初期对欧洲式的权力政治持鄙视态度。瓦尔特·麦克道格尔（Walter MacDougall）表示，美国从1776年建立开始到1898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这之后，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它放弃了置身事外的优雅，因为崛起的实力将其转化为一个“为理想而战斗的国家”。^②

与麦克道格尔对美国背弃其初衷的描述一样，大量对美国冷战期间表现的解读也是倾向于批评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美国外交》可能是明显最具有批判性的。^③凯南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系列演讲时，这位著名的“长电报”作者将美国外交分为六个关键阶段，其中从美西战争到二战期间是美国寻找外交动力的时期。他找到了既合乎美国法律又符合美国道德的外交政策渠道，他认为这一渠道是令人惋惜且具有危险性的。对凯南以及所有现实主义者而言，应该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法律或道义主导政策。凯南担心由法律或道义主导的政策会在与苏联对抗期间危及美国安全。

但是他不需要担心：法律与道德在塑造冷战期间美国行为时让位给了

① “山巅之城”最早的使用参见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Godfrey Hodgso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也可参见 Tami R. Davis and Sean M. Lynn-Jones, “City upon a Hill,” *Foreign Policy*, No. 66, 1987, p. 22;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Walter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98);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Knopf, 2001)；“不可或缺的国家”是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1996年对美国的描述，转引自 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1999, p. 35。

② Walter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③ Georg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现实政治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先是苏联然后是中国，这两个国家都威胁了美国的思想并且促使美国对感知到的权力地位的威胁进行了多次回应，从朝鲜到越南到尼加拉瓜再到安哥拉。由于担心美国权力的声望和信誉再加上吸取了历史上不使用权力的教训，法律与道德的思维被迅速抛弃，以至于《美国外交》的后续版本中，凯南考虑美国是否可以牺牲一些法律与道德来换取现实政治中的国家利益。然而在冷战期间，这些长时段的解读让位给了更加传统的外交史研究以及创立和检验理论的政治科学家们的案例研究。

随着冷战的结束，对美国长时段行为的解读再次兴起。苏联的消亡意味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说单极国家。这只是一个单极的时刻还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当其他人对美国霸权能否持续持怀疑态度时，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做出了一个更好的论断，他认为美国单极能够持续一代人，结果稳定的世界秩序保持了下来。^①当国际关系学者讨论单极是否以及何时会被多极取代，对美国的“软制衡”是否已经在进行时^②，另一些围绕美国帝国的著述出现了。

“9·11”事件之前，这种情况就已经显现出来，然而袭击之后，随着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对帝国动机的描述急剧增长。美国帝国的概念激发了本文的写作目的，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关于帝国的观点催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恰当描述。^③第二，与大多数其他从美国外交政策动机和形式中得出

^①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5 – 41.

^② Robert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 – 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46 – 71;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2 – 108.

^③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Andrew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Allen Lane, 2004);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London: Verso, 2004). For a statement of the empire thesis from an earlier period and war, see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Growth and Shaping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a Marketplace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的假想概念描述不同，美国帝国的概念从理论内涵上更加丰富。^①第三，这一概念与笔者对美国是一个朝贡体系轴心的描述最为接近。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说明朝贡与帝国的区别，以及朝贡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分析上的吸引力是“帝国”概念所不具备的。

对美利坚帝国的描述常常以新英格兰殖民地向西扩张、劫掠美国土著人以及为兼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而与墨西哥进行的战争开始。保护好大陆的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前提。经过一个世纪，美国成为了世界强国，并且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超过了英国，之后美国也开始寻求海外领地。像英国和法国在鼎盛时期一样，美国打响了美西战争，开始了寻求殖民地以及成为一个帝国的进程。美国参加了二战，阻止德国和日本的霸权控制欧洲大陆和东亚，胜利意味着美国成为了西欧和东亚的霸主。1945年到1991年之间，美国不得不对抗苏联，然而美国政治思想、经济、技术和文化（软实力）的优越性使其超越并最终坚持到了最后。传教士们建立了遍布世界的数百个基地，他们对美国权力的执行促使美国位于诸国之上，比以往大多数时期都更能迅速实现意愿。因此，有人将美国称之为“新罗马”。^②

然而，帝国概念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帝国”的概念引申出了罗马、英国和法国的形象，这与美国对自己的判断格格不入。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说得很清楚“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从历史上和性质上看，美国不是帝国，更不要说帝国主义者。”^③之后卡赞斯坦不假思索地指出在欧洲和亚洲的“美国统治权”。^④但是，帝国/统治者与“山巅之城”的构思完全不同，所以前者很难被多数美国人所接受。这就是为什

^① 参见 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对美国的帝国方式作了令人鼓舞的比较论述。

^② Andrew J. Bacevich, “New Rome, New Jerusalem,” *Wilson Quarterly*, Vol. 26, No. 3, 2002, pp. 50 – 58; Cullen Murphy, *Are We Rome?: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7).

^③ 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p. 209.

^④ 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chapter 7.

么美国官员几乎从不在公众面前说出这个“E”开头的词。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认识到这一概念的一些效用，也要在前后添加形容词才使用，如“非刻意的帝国”“受邀请的帝国”“轻度帝国”。^①这些限制条件强调了美国帝国的被接受性和善意。与之前的帝国不同，美国的从属国“邀请”或者同意美国的主导权，或者美国经历曲折成为了帝国但是采取“轻度的”控制。美西战争以来，美国获取和兼并土地或者阻止别国这样做的行为对于承受者来说并不是“轻度的”或“非刻意的”。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帝国的本质是否被这些限制条件去除了呢？

大卫·西尔万（David Sylvan）和斯蒂芬·马耶斯基（Stephen Majeski）最近提出了帝国理论的一个新变种，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作庇护人与扈从人之间的关系。^②他们解释的新颖之处是关注美国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手段，他们认为这些手段是塑造美国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同样有意思的是他们将世界其他国家分为是美国的保护国和非保护国，后面我们会用美国的朝贡国和非朝贡国的指标代替。笔者与西尔万和马耶斯基的不同之处集中在手段方面，他们似乎忽略了美国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获得这些权力手段。他们认为“1898年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相对缺乏权力手段……决策者几乎没有立即可用的处理问题的措施……”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90年代更是如此，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已经拥有了一套成熟的政策手段，这些手段成为与……打交道的标准方式”。^③

对政策手段的关注要求我们回答这一问题，什么导致了这些政策手段

^① William Odom and Robert Dujarric, *America's Inadvertent Empi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3, No. 2, 1999, pp. 189 – 217; Michael Ignatieff, *Empire Lite: Nation-building in Bosnia, Kosovo and Afghanistan* (London: Vintage, 2003).

^② David Sylvan and Stephen Majeski, *U.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Clients, Enemies and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③ David Sylvan and Stephen Majeski, *U.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Clients, Enemies and Empire*, pp. 251 – 252.

的出现和扩展？答案当然是美国实力的增长。西尔万和马耶斯基的时间划分就表明了这一点。历史学家认为美西战争发生的1898年意味着美国成为了世界大国。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欧洲霸主，因为如果没有美国介入二战，西欧可能会被希特勒控制。90年代，美国延续了其单极地位。换言之，西尔万和马耶斯基研究政策工具的发展和可行性是正确的，但在笔者看来需要强调的是，正是美国实力的增长使获取政策手段成为可能。^①

然而，帝国和庇护—扈从的概念蕴含着新的和潜在的丰富思想：美国类似中国明清时代朝贡体系的轴心或中心。上文以及其他著述中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朝贡体系是理解美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一种可能的框架。^②也没有任何新的、重要的研究中国朝贡体系的成果将朝贡体系与美国外交政策联系起来。^③这就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① 参见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especially chapter 5.

② 有两项关于等级的重要著述涉及本文讨论的一些主题，但是它们并未使用朝贡框架来分析美国。莱克的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认为，等级与无政府作为国际关系的组织原则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莱克的分析聚焦于美国与“附属”国家之间关系的等级性，他认为美国提供“秩序”以换取附属国对等级关系的顺从并赋予其合法性 (pp. xi, 176)。本文所阐述的观点与莱克关于相互交换的东西的论述是一致的，但是强调了莱克模型中缺失的一项关键内容：美国期待二流国家效仿其政治理念和形式。后者（包含政治—心理的考量）很难被纳入莱克的交易模型。Evelyn Goh, “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 8, No. 3, 2008, pp. 353 – 377. 此文对东亚的“多层次地区等级”作了细致的论述，其中美国提供“等级保证”以换取“顺从”。

③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01, pp. 43 – 63;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Broadening the Conceptu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East Asian Politic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4, 2009, pp. 545 – 574; Zhou Fangyi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2, 2011, pp. 147 – 178; Song Nianshen, “‘Tributary’ from a Multilateral and Multilayered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2, 2012, pp. 155 – 182; 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p. 3 – 36;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2012, pp. 37 – 54.

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方式的相似性没有被发现？对于一个沉浸 在“例外主义”模式中的国家来说，将自身与其他国家（即使是而且特别是欧洲！）相比时非常困难。“新世界”“山巅之城”“特有的远见卓识”将美国塑造为一个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层面都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度。如果说美国例外论的“他者”是欧洲，那么可以想象把美国比作中国是多么的陌生。鉴于两国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会是个极不合适的比喻，也许甚至是一种诅咒。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笔者依然有兴趣将中国朝贡体系和美国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相比。笔者想要论证美国朝贡体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这种运用不仅能让我们理解霸权和民主对美国决策者的重要性，也能促使我们将一些散点连接起来——如美国对保持声望和信誉的强调——这通常是被现有框架所忽视的。那些认为这一运用太过陌生或者很奇怪的人可以将文中的分析视为一种“可能性的探索”，如在开展全面研究前，考察朝贡概念潜在意义的一种尝试（应用在美国身上）。如果本文能够激发我们在理解美国对外行为时关于朝贡概念的适用性和新颖性的讨论和争辩，那么本文就达到了目的。

笔者认为美国朝贡体系的概念包含了上述观点的同时，还增加了它们没有强调的关键性见解。与上述观点一样，朝贡模型也从美国霸权概念开始。通过回避帝国的标签，朝贡模型在“山巅之城”和帝国概念之间建立了一个中间地带。也就是说，与帝国理论相比，它与美国的自我认知更加协调。如果认同中国朝贡体系有助于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帝国直接的征服与控制），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朝贡概念实际上比乍看起来更接近“山巅之城”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朝贡概念明确了美国对世界的期待，其他观点都没有强调或深入研究过这一点。美国要求朝贡国承认其主导地位并且效仿其政治思想和形式（正如中国希望朝贡国模仿其文化形式一样）是朝贡概

念特有的贡献。^① 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将这两种期待分开：美国要求霸主地位一部分是因为其超强的物质实力，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② 如果不从美国希望世界承认其在国际权力等级顶端的角度考虑，我们又怎么解释美国从未改变的类似不得不提供“领导”或者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话语呢？美国当初参加一战是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存在”，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人权报告羞辱——有时是惩罚——那些没有给予其公民基本尊重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难道不等同于要求其他国家接受其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政策吗？希望对话者和盟友效仿其自由民主思想的愿望深植于美国的基因之中。将这种报偿视作贡品，即美国付出后所期望的回报以及从属国自愿的效忠，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深层考虑”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本质。

现在我们差不多了解了哪些是美国的朝贡国，即美国的正式盟友和非正式战略伙伴。后者主要是指那些领土上有美国基地或军事设施的国家。总体而言，这些国家与美国在军事战略意义上是盟友，同时对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上的领导地位感到满意。^③ 事实上，西尔万和马耶斯基关于美国外交的大量而丰富的著述中对“扈从国”和“非扈从国”进行了编码，笔者采纳了他们的这一标准。^④ 这样做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尽管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但是我们正在试着了解一个大致相似的现象（庇护国—扈从国或轴心国—朝贡国之间的关系）；第二，

① 通过比较罗马和美国“帝国”，下书提及了朝贡的概念：Emmanuel Todd, *After the Empire: 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Order* (London: Constable, 2006)。对于托德而言，美国从其盟友那里获取的贡品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包括从军售中获取的收益。

② 王缉思指出了美国民主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紧密关系，参见 Wang Jisi, “The Logic of the American Hegemony,” *The Study Times*, December 10, 2003, pp. 4, 6, 11–12; 也可参见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其中强调了自由民主制度与美国的霸权秩序的弹性之间的联系。

③ 并非所有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许多国家不是。参见附录中表 A1 关于美国的朝贡国的列表，按照相互亲密程度进行排列。

④ David Sylvan and Stephen Majeski, *U. 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pp. 33 – 37, fn. 56.

西尔万和马耶斯基已经收集了一套高质量的、全面的数据，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家们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检验自己的观点。

这些理由也使得我们接受他们所列举的美国的“扈从国”，并将这些国家近似地视为美国的朝贡国，将美国的“非扈从国”近似地视为非朝贡国。这里存在的风险就是将这些概念引用过来可能会有损朝贡概念的准确性，然而根据本文的目的，引用这些高质量的并非为朝贡理论专门收集的数据，好处大于损失。数据显示，世界上 40% 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扈从国”或者朝贡国。^① 2005 年，美国的“扈从国”或朝贡国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是：西半球（97%），中东/北非（55%），欧洲（43%），东亚/大洋洲（43%），高加索/中部和南部亚洲（13%）以及非洲（7%）。^②

二 中国朝贡体系

中国的朝贡体系通常被认为是组织和规范 19 世纪以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手段。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认为，它是“大多数有记录历史中处理大规模人口的国家间关系”的体系。^③ 一般认为，14 至 19 世纪（明朝和清朝）朝贡体系达到顶峰，体系将中国的文化、经济和安全与其东亚邻国和遥远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康灿雄（David Kang）最近对中国朝贡体系及其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的研究中，他对朝贡体系是什么做了一个简练且具有史学敏感性的详细说明：

朝贡体系是一套制度性结构。在早期东亚政治行为体中，它提供了一个协调对外关系的主要框架。随后，逐渐发展起来一套规范外交

① David Sylvan and Stephen Majeski, *U. 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p. 33.

② David Sylvan and Stephen Majeski, *U. 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pp. 34 – 36.

③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

关系、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规则和制度，并且为体系提供一个明确的秩序。^①

为了实现分析的目的，有必要将构成朝贡体系的观念、制度性结构和规则分为以下六个特征。

（一）中国中心主义和伟大的文明

中国将自己视为“中央王国”或者是“中心国家”，是公私美德、良好治理、恰当行事和思想智慧的来源和典范。正如以上这些类别所表明的，尽管中国比所有邻国都更辽阔、更强大而且更富有，中国寻求的伟大和中心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物质的。费正清认为，中国的著作体系、孔子学说及其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的君主制和官僚机构”与“古老、广大和富有”结合在一起，“都赋予了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②这一关于中国文化具有优越性的假设或神话衍生出了许多中国朝贡体系的其他特征。与外国人进行贸易是朝贡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是这对国内外的商人比对皇帝更重要。朝贡对外国商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贸易的物质价值”。^③尽管中国商人也会从经济交换中获得物质收益，然而“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重要的是朝贡的道德（而非物质）价值。”^④

①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p. 81.

②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2.

③ John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1942, p. 139. 在费正清1968年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朝贡贸易的特征不及文化和政治重要。关于贸易在中国朝贡体系中的作用的准确讨论，参见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chapter 6.

④ John K.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p. 139; 也可参见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13. 其中他对贸易（物质利益）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种“目标”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排序：对于最内层的中华圈国家来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超越了贸易；对于中华圈以外的国家（俄国、荷兰、苏禄等）来说，贸易超越文化。

(二) 等级、不平等和霸权

在中国朝贡体系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存在主权平等的原则。主权平等在理论和实践中是不可能的，正如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所论述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传统看法并非简单建立在遵循世界应该是文明等级化的这一抽象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具体的信念，即中华文明就是那个文明”。^①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想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和开展贸易的国家就不得不接受从属地位。中国居于该体系的顶端。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的霸主。就像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所强调的那样，霸权并不只是建立在物质优势的基础上，也包含他国认可——即使不是明确的也是默许的——霸主的领导地位。^② 只要等级和中国的霸权得到承认，国家间的和平就可能出现。^③

(三) 从中心向外辐射

前两个特征蕴含了第三个特征，即其他国家——非中国——如何适应中国的世界秩序。从中心（中国）向外的辐射范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中华区域或“中华文化区”，包括朝鲜、越南、琉球和日本；亚洲区域（蒙古、西藏地区和中亚）和外部区域（俄罗斯、苏禄、葡萄牙、荷兰和英国）。^④ 从排序可以清楚地看出，区域的划分取决于与中华文化的距离，例如距离最近的属于中华区域，最远的则被视为是区域外的“蛮夷”。在中华区域内的好处是藩属国可以获得更好的声誉（因为比其他国家距离中心更近），也可以派遣更多的朝贡使团，后者则意味着更多的贸易机会。因

① Benjamin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 286.

② 康灿雄将霸权定义为“一种等级，来自于一些国家对另一国家（霸主）的领导地位、更大责任、影响力和作用的认可”。参见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p. 2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6, fn. 6.

③ David Kang,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 54.

④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2.

此，在清朝 1818 年的朝贡国中，朝鲜可以一年派四次使团，琉球每隔一年派一次使团，越南每两年派一次使团，暹罗每三年派一次使团，缅甸十年派一次使团，而葡萄牙和西班牙派遣朝贡使团则“不定期”。^①

（四）礼仪与朝贡

中国朝贡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藩属国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时需要遵循一套礼仪。这些礼仪被视作是中国规范对外关系的方式。关键的礼仪包括：（1）藩属国向中国派出使团（注明来朝贡的单向线路）；（2）外国使臣在皇帝面前行跪拜之礼，即“对从属身份象征性认可”以及“他们对‘臣属’国或‘臣属’部落地位的认同”；^②（3）呈献贡品，贡品通常是以本土产品的形式，如黄金、珍珠、马匹和大象，皇帝也会回赠“臣属”礼物，回赠物品的价值往往更高；（4）册封仪式，中国通过这一外交礼节承认统治者（藩属国的）代表主权并成为其领土上合法的王公。^③尽管藩属国主要的收益来自于所有礼节性的仪式和表演之后，如贸易和经济交换，但是通过参加这些仪式，藩属国强化了对潜在的规范和中国朝贡体系（其他特征）的假定。

（五）一个仁慈的、非强制性的轴心

尽管中国的富有和军事实力使其在这一地区成为无可争辩的霸主，但是中国对文化成就的强调“要求中国感化其他国家，让它们根据特定的品德规范恰当地行事”。^④这些品德规范来源于儒家学说，后者强调家庭内部、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等级关系。等级关系出现后，通过来自中国经典教材的教育，就能创造“人间正常有序的生活”，随后就是和平

①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p. 11.

② Morris Rossabi, “Introduction,” in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 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

③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p. 56.

④ Li Zhaoji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1, 2002, p. 30.

与和谐的出现。对于“蛮夷”来说，他们会被同化，即使没有完全被同化，也会“出于道德和善意的考虑，为天子给予他们的福祉而尊崇伟大的中华文明。这是因为天子具有怜悯之心和慷慨之心”。^① 中国对外行善的动力是对自身声望和道德的认可，武力的使用也是可以避免的。

（六）国内即国际，国际即国内

对外具有文化优越性的想象也是国内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中国是文明和美德之源，中国的统治者是上天之子，是天下的主宰。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即使是当中国优越性的想象与中国实际的外交实践不一致的时候（就像中国将中亚地区的一些“蛮夷之邦”视为平等的一方），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维持这种想象也十分重要。正如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所说“世界主宰者的想象是统治中国的一个有用的意识形态手段。”^②

以上对中国朝贡体系的描述主要来自费正清的正统论述。然而，还存在一些重要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果用朝贡作为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概括，那么它的准确性和效力何在。例如，在等级关系方面，在中国国力孱弱的时期，如宋朝，朝贡关系的原则就变成了中国向别国称臣纳贡。^③ 文化的重要性也受到了质疑。例如，何伟亚（James Hevia）将中国朝贡体系与大英帝国相比较，将它们的“接触”视为“发生在两个帝国组织之间，每个都自命天下不凡并且都有复杂的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支持的帝国间的碰撞。”^④

^① Li Zhaoji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p. 30.

^② Joseph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 – 1884,”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 224.

^③ Wang Gungwu, “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pp. 47 – 65.

^④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5.

关于这一主题的多样性观点来自于理解中国外交政策时务实的和现实主义的考虑，而不是文化的思考。^① 张锋利用这些研究作了一项令人振奋的社会科学评估，他认为中国行为的差异使得朝贡模型不能实现分析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张锋认为，行为差异不仅会出现在中国孱弱时，也会出现在中国强大时。例如，明朝初期，洪武皇帝处理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因为“声望和合法性”，也有安全上的考虑；与朝贡模型相悖的是，中国皇帝不仅采取说服的手段，在必要时还进行要挟。^② 尽管费正清也注意到了这些例外，但是张锋认为这些事件应该包括在模型之中，这样一来会更好地了解更实际的、有安全和权力考虑的中国。^③

这些研究给费正清的框架做了有益的修正，也深化了我们对朝贡体系的理解。通过提醒我们朝贡原则的表现和应用中存在重要的差异，这些研究激励我们进一步明确观点适用的时间段。与康灿雄一样，本文描绘的是明清两代的朝贡体系，此时朝贡体系达到巅峰。我们更侧重后者是因为我们希望将同样达到权力巅峰的中国与美国相比较。我们也不需要假设上述六项特征在整个中国朝贡体系时期都是不变的或者只有这些特征是重要的，而是只要它们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且突出了对中国朝贡体系的主要解释就足够了。

对费正清的批评为我们理解朝贡体系的实际运转增加了重要的视角，如防御的考虑和采取现实政治的措施，在笔者看来这些批评并没有泯灭费正清关于文化中心性的核心思想。费正清文化模型的解释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来解释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人入侵时，为什么中国的对外关系很难保障它自身的安全。如果现实政治

^① 关于朝贡体系的防御和安全考虑，参见 Wang Gungwu,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Background Essa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pp. 34–62;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and especially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pp. 563–572.

^②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pp. 563–564.

^③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p. 573.

或务实的安全考虑在明清两代起支配作用，中国就有超过四个世纪的时间来准备抵御军事上的入侵。这无疑将会给任何潜在的侵略者致命一击。而事实却是，中国在面对欧洲“帝国联盟”时无法这样做。事实支持了这样的论断，即理解朝贡体系的关键是中国关注文化，而不是政治—军事和实力。

朝贡体系对东亚国际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康灿雄认为朝贡体系给中国和这一地区带来了五个世纪的国际和平与稳定。^① 在缔造和平中，以上六个要素均发挥了作用。东亚大多数国家都接受或者至少不挑战中华文明的伟大。被中国同化的国家自发给予中国它所期望的——承认其霸主地位并且认可其文明优越性。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就是朝贡使团、跪拜和册封仪式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对于藩属国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它们可以获得保护和贸易。藩属国也引进中国的思想体系，这可以理解为它们希望在彼此之间沿用朝贡模式，并且期待统治者/官僚如此行事。康灿雄认为藩属国并没有在背后嘲笑中国的朝贡模式。它们将儒家的价值观内化并且将其运用于处理彼此关系。^②

根据中国朝贡体系的原则和效果，现在我们可以问：它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方式有相似性吗？本文的任务并不是发现精确的类似——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成的——而是要在与中国朝贡体系的要素和运行相像的美外交中找到可能的相似。类比推理并不一定是发现新现象或假设的最好的启发式方法。^③ 例如，用中国的朝贡观察美外交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在哪些方面可以与中国中心主义/文明的伟大这一假定相类比？我们随后提出的假设会被认为有悖于美国历史和当代的外交经验。

表1表明，概括而言，美国与上述中国朝贡体系的每个特征都相类似。下一节将对这些类比进行详细论述。

^① 这是此书的主旨：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pp. 1 – 2, 10 – 11, and chapter 5.

^②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pp. 68 – 74.

^③ Davi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 259.

表 1 中国朝贡体系与美国朝贡体系的特征比较

中 国	美 国
1. 中国中心主义 ⇒ 中华文明的伟大	1. 美国例外论 ⇒ 美利坚民族的伟大：站得越高，看得越远
2. 等级/不平等	2. 霸权/领导地位
3. 建立在文化效仿基础上的紧密关系	3. 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效仿基础上的紧密关系
4. 善意的/非强制性的	4. 善意霸权/公益
5. 外交礼仪 ⇒ 朝贡使团 ⇒ 叩头仪式 ⇒ 册封	5. 外交礼仪 ⇒ 国事访问和峰会 ⇒ 年度人权报告/在国会演讲 ⇒ 承认/不承认
6. 国内—国际联系：天子/天下的统治者	6. 国内—国际联系：自由世界的领袖

三 美国朝贡体系

(一) 美国例外论与民族伟大

中国中心主义的美国对照就是美国政府与外交研究者们所熟知的一种思想：美国例外论。^① 从约翰·温斯罗普的“山巅之城”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 的“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美国对自己的认识总是围绕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展开的，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② 中国将自己视为中央王国——一个假想的宇宙的中心，而美国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位居一个假想的世界的顶端。与中国一样，美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与“他者”之间的道德距离。新世界中的“他者”是旧世界——欧洲，在那里流行的是不平等、独裁统治、战争和均

^① Godfrey Hodgso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s one of the most recent statements; 也可参见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② Godfrey Hodgso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p. 10.

势政治。如果说中国道德正确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儒家文化，那么美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则是自由民主制度，其核心是个人自由。上天的眷顾对于二者的政治认同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皇帝作为天子统治“天下”，美国人则认为自己的土地以及他们自身受到了上帝和天命的庇佑。正如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所说：“上帝赐予这片土地无尽的庇佑，选择你们作为自由的保护者，为了人类的利益加以捍卫。”^①

不过，仅有差异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在等级秩序中占据核心或轴心地位。中国宣称自身的伟大，是万邦来朝的中心，这是建立在关于其文明优越性的话语之上。美国是否也有伟大的概念？如果是这样，它的假设是什么？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曾指出，民族伟大的愿景构成了20世纪初美国意识形态的三个支柱之一。^②这种愿景以通过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保护和促进自由为前提。

尽管一些人最初担心追求民族伟大会强化行政部门的力量到危害美国国内自由的地步，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民族伟大的政策实际上会增强国内自由——赢得了辩论。当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不足为奇，民族伟大的愿景捕捉到了民众的想象力，将这种愿景与保障和发展自由结合起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传教士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很好地归纳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他说道，上帝“号召人类接受我们的征召”。^③正如约翰·温斯罗普和安德鲁·杰克逊的话所表明的，从“山巅之城”到“民族伟大”不需要太大的精神飞跃，所需要的不过是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理由，而美国在自由的理念中发现了它。美国精英们想出了一种关于国内自由与国外自由之间紧密而又相互促进关系的观点。亨特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心态：一项致力于自由和

^① 转引自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0; 也可参见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②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p. 17 – 18 and chapter 2. 亨特提出的另外两个支柱是种族等级和对社会革命的反感。

^③ 转引自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 37。

伟大的政策……远非相互矛盾的事物之间危险而不确定的联盟。相反，海外的伟大会强化国内的自由……为了捍卫他们对自由的信仰，美国人会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改造别人，而世界会为之敬畏。^①

追求民族伟大，支持海外自由以保护国内自由，以及按照美国的想法改造他人，这些仍然是美国外交（正如熟悉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所知道的）、美国人的言语行为以及美国分析家的著述试图表现的恒久主题。从伍德罗·威尔逊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存在”而参加一战到二战后将德国和日本改造为民主国家，到赢得冷战成为单极霸主，到克林顿政府（以及之前的里根和卡特政府）扩展民主的努力，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美国会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按照这些需要行事。^②当然，也有一些与之竞争的需要，如战略需求（‘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巴林）、经济复苏（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或世界舆论（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搅乱了支持自由和追求伟大的政策，但是这些并未减弱它们作为美国内外政策支柱的总体重要性。

（二）等级、不平等与美国的领导地位

当美国在1898年作为一个强国登上世界舞台之时，主权平等规范已经稳固地扎根于国际社会之中。半个世纪以后，这种规范被认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准则，二战之后被写入《联合国宪章》之中。然而，无论《联合国宪章》作何表述，很少有人会认为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加以对待。的确，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说，美国可能会通过实施“战略克制”、创建旨在提供安全和经济秩序等“公益”的国际制度并将自己捆绑在其中来缓解不平等。由此，美国可以“认可”朝贡国加入美国主导

①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 42.

②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omas Carothers,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and Michael Cox, G. John Ikenberry and Takashi Inoguchi,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的霸权体系。^①但是，这并不能与国家之间存在真正的、实质性的平等混为一谈。联合国的制度架构——存在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与主权平等的说法并不相符。一些国家实际上比其他国家更有特权。

就五大常任理事国而言，美国因为其军事、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优势而居于首位；美国的军事开支超过其他大国的总和；美国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是最高的，而它的研发和技术力量也无与伦比。^②美国也认为自己——而且许多国家也认为——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正是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的综合实力让美国成为一个单极霸主。

让我们考察一下有美国军事基地或设施的 77 个国家。在外国领土上拥有军事基地是强国的特权。但是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网络（2006 年有 766 处），这使得美国能够将力量投向地球上的遥远角落。^③正是这种军事触角——得到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先进武器的支持，同时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创新力的经济做支撑——使得美国比它的敌对者和仰慕者更强大。换言之，等级和不平等是美国与二流国家关系中的固有内容。对于美国而言，拥有军事基地是经济和军事安全的需要——保护海上航线、投射力量和威慑敌人。反过来，接受这些军事基地的国家获得了美国的保护，通常还会获得经济和财政上的好处。

朝贡框架突出了美国与二流国家或朝贡国之间关系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这一框架也强调了二流国家愿意接受这种等级性。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有关美国军事基地的研究很好地抓住了东道国与美国的关系，他指出：“所有的基地协议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等级制的安全合同，其中当东道国接受在其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存在时，它在法律上

^①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参见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 – 35;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2011), pp. 157 – 163.

^③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 S. Military Overse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

已经让渡了部分主权。”^① 东道国或朝贡国牺牲了一部分领土主权，来容纳一个友好的外部大国的军队及/或资产。当它们与美国签署《驻军地位协议》时，它们也交出了部分政治主权，因为根据这一协议美军人员受美国法律而非驻在国法律管辖。^② 尽管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为何认为《驻军地位协议》非常重要，但是损失政治主权在东道国内部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另一项能够说明美国首要地位（以及其他国家接受这种地位）的指标是围绕美国权力类型的话语。我们之前已经指出，历史学家们喜欢用帝国这个称呼，但是这个称呼并没有引起美国决策者、国际关系专家和外国精英的太大共鸣。法国前外长创造的“超级强权”（hyperpower）一词也暗示着心理上的不满。美国人的自我认识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超级大国（1945—1990年）、霸权（自20世纪初以来）或单极国家（自1991年以来）。^③ 尤其的是，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描述都源自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国际关系学者的工作就是提供对所研究现象的恰当描述。这些描述也希望做到价值中立，即避免规范内容。比如，威廉·沃尔福思用历史上和当下的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三维图表来论证他对美国是一个单极国家的描述。^④ 一旦形成并成为主流，这些表述——及其所包含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就成为使用者看待世界的分析框架。^⑤

①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 S. Military Overseas*, p. 10.

②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 S. Military Overseas*, pp. 33 – 34.

③ 以“美国霸权”或“单极”为题的著述真是难以胜数。每个词举两个例子就够了：Lea Brilmayer,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 Superpower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kashi Inoguchi and Paul Bacon, “Empire, Hierarchy, and Hegemony: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 5, No. 2, 2005, pp. 117 – 132;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 5 – 41; Ethan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⑤ 成为主流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议。亨廷顿试图引入“单一多极”的概念来驳斥毫无隐讳的单极概念，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p. 35。

不过，单极和霸权并不是美国决策者以及美国的朝贡国喜欢使用的表述。单极听起来过于社会科学、缺乏灵魂，而霸权带有主宰的意味。^① 他们喜欢的表述是美国的领导地位。图1是“美国和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N元语法模型，显示出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经常被人们与世界领导地位联系在一起。它表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一短语开始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书（英文）中，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它的使用呈急剧上升趋势。英国曾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但是与美国相比显得相形见绌。N元语法模型发现，实际上英语世界中没有著述将世界领导地位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或可认为图1中苏联的数据为0）。确实，大部分著述都是美国人所写，但是人们也会期待这些著述中包含来自其他英语国家、总体上认同“需要美国领导地位”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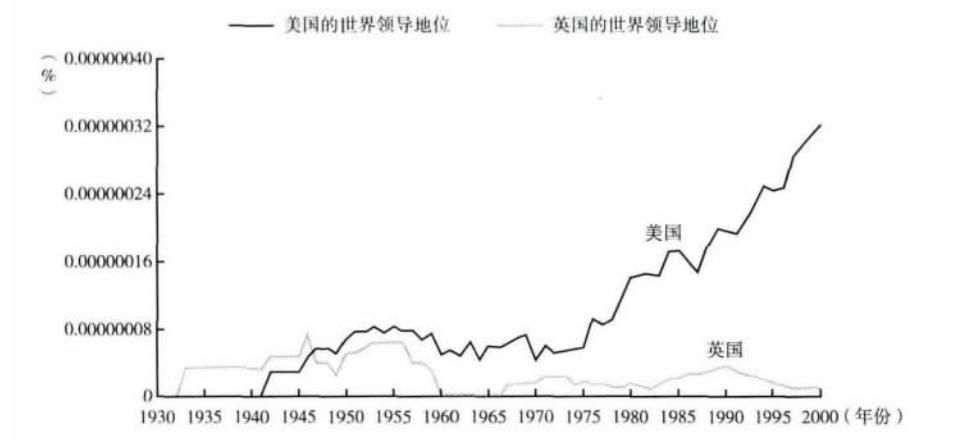


图1 “美国和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N元语法模型

在后冷战时代，两种官方话语和政策都支持了这种有关美国领导地位的看法。官员们谈论的是美国的领导地位，学者们的著述也支持这一点，而五角大楼的计划宣称要阻止其他大国——无论友好与否——

^① 中国和俄罗斯官员/学者都批判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他们认为由一个强权主导是不可取的，并且誓言不谋求霸权。他们喜欢一个多极世界。

挑战美国在世界主要地区（欧洲、海湾地区和亚洲）的地位。^①当美国关于“世界新秩序”的看法在1990年遭到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的挑战时，美国感到自己有必要发动战争来挫败伊拉克对其富裕的弱小邻国的侵略。

美国领导地位的必要性和可取性在丹妮尔·普莱特卡（Danielle Pletka）——来自保守派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位温和派共和党人——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普莱特卡的文章写于2012年总统选举的高潮时期，她试图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提出一些重要的外交政策建议。她警告罗姆尼不要成为“乔治·W·布什的翻版”，随后又用人们所熟悉的美国自我描述呼吁，基于对“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权力如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繁荣和成功的时代”的理解提出了“美国伟大的新愿景”。对于普莱特卡而言，关键是“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行使领导权并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因为没有哪个大国以及哪个民族有能力和意愿发挥我们在世界中的作用那样的善意影响力。无论你是否喜欢伊拉克战争，是否喜欢阿富汗战争，是否认为卡扎菲应该下台，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美国并没有恶意”。^②

普莱特卡是一位共和党人，但是她的赞美超越了美国的政治光谱。它完全符合美国对自己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自我理解。“伟大”“领导地位”“没有人能做到”“善意”“没有恶意”等关键词在有关美国世界地位的官方、学术和民间讨论中会反复出现。

当奥巴马在2012年11月再次当选总统时，他在演讲中少数几处有关

^① “U. 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http://www.nytimes.com/1992/03/08/world/us-strategy-plan-calls-for-insuring-no-rivals-develop.html?pagewanted=all&src=pm>.

^② Danielle Pletka, “Mitt Romney’s Missing Foreign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0/08/opinion/mitt-romneys-missing-foreign-policy.html>. 普莱特卡所强调的美国外交政策特征符合表1所归纳的大多数美国朝贡体系的表现。她没有论及的一个表现是“外交礼仪”。

外交政策的内容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安全而备受尊重的美国，一个拥有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有信心……塑造和平，许诺为每一个人带去自由和尊严”。总统在演讲结束部分指出，这次选举“告诉世界为何美利坚合众国是最伟大的国家”。^①这种竞选胜利后的话当然不能太当真，但是其中的主旨——军事威力、善意的世界领导地位（得到世界的尊重以及塑造事物的能力）以及政治自由——与共和党人普莱特卡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

（三）民主作为最真诚的奉承形式

在中国朝贡体系中，存在着两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中国，位于体系的顶端。第二个等级是在朝贡国之间，那些在文化上与中国最为相似的国家比那些不太相似的国家排序更高（也获得了更多封赏）。在美国的案例中，美国当然占据着首要地位。但是二流国家会进行排序吗？当然会。正如表2所示，那些位于美国朝贡体系顶端或内圈的国家绝大多数是自由民主国家。

与美国的紧密程度或接近程度是依据按照本文目的提出的15项指标进行衡量的。这些指标包括：1945年以来参加美国的战争、在本国领土上驻有美军及/或美国基地、有机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于美国舆论而言与朝贡国有多友好、免签证待遇、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945年以来的正式军事盟友、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经合组织成员国、情报分享的主要伙伴，等等。附录中的表2A显示了美国的朝贡国和非朝贡国在每项指标上的得分；表2B则简要描述了这些指标，并且指出了每项指标的数据来源。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详细阐述每项指标，但是大多数指标应该没有异议。一国如果符合某项指标则得1分（如韩国参加了越南战争则得1分），最多为15分。

^① “President Obama’s Election Night Speech,”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2012,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2/11/06/us/politics/06-obama-night-speech.html>.

表 2 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朝贡国^{***}

排序	得分 ^{**}	国家/地区
1	12—14	韩国、澳大利亚、英国
2	10—11	加拿大、法国
3	8—9	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
4	6—7	比利时、希腊、爱尔兰、以色列、卢森堡、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
5	4—5	阿根廷、智利、丹麦、埃及 [*] 、约旦 [*] 、科威特 [*] 、墨西哥、挪威、波兰、葡萄牙、巴拿马、秘鲁、新加坡 [*]
6	2—3	阿富汗 [*] 、奥地利、巴林 [*] 、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 [*] 、危地马拉、海地 [*] 、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拉克 [*] 、尼加拉瓜、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 、瑞典、台湾地区、委内瑞拉 [*]

注：排在第 1—4 位的国家全都是美国的朝贡国；排在第 5—6 位的国家也主要是美国的朝贡国，但是包括一些非朝贡国（未列入表中）。其中排第 5 位的非朝贡国有：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拉脱维亚、摩洛哥^{*}、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南非。排第 6 位的非朝贡国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印度、爱尔兰、立陶宛、罗马尼亚、瑞士和乌克兰。中国是一个非朝贡国，没有出现在表 2 及表 2A 中，因为它的总得分是 1（与美国有一些情报合作），低于 2 分的下限。

^{***} 原始数据来自 David Sylvan and Stephen Majeski, *U. 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Clients, Enemies, and Empire* (Routledge, 2009), pp. 34—36。关于构成“扈从国”的指标，也可参见他们的讨论，pp. 29 and 259, fn 56。出于本文的考虑，他们关于“扈从国”和“非扈从国”的分类被相应地重新划分为朝贡国和非朝贡国。在他们所列的美国在全球的 81 个扈从国中，有 50 个（62%）出现在上表中。他们的数据集中所列的一些小岛国（如巴哈马、圣卢西亚和帕劳）被省略；被省略的还有那些分值低于 2 的国家。

^{**} 得分是根据与美国关系紧密程度的 15 项指标加总获得的，参见表 2A。表 2B 简要描述了每项指标以及所使用的来源。

^{*} 按照“政体 IV 项目”的标准/框架计算，带* 标的国家是非民主国家。更具体而言，它们既不是独裁国家（政体得分 -10—-6），也不是有限民主国家（介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中间类型，政体得分 -5—5）。根据“政体 IV 项目”的标准，得分 6—10 的国家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参见表 2A 中朝贡国/非朝贡国的政体得分，也可参见 www.systemicpeace.org/org/polity/polity4.htm。

结果基本符合我们关于哪些国家是美国的最亲密盟友和朋友的直觉。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是美国的最亲密盟友或朝贡国（第一组）；韩国在 15 个单元格中有 14 项得分，而澳大利亚和英国有 12 项得分。加拿大和法国占据第二组，而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西班牙位于第三组。第四组中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希腊、爱尔兰、以色列、卢森堡、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

人们不必过分在意特定盟友或朝贡国所在的组别。有些人会说日本和以色列的排位应该会高一两组或者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即便如此，也不会改变表2所透露出的核心信息：美国最亲密的朝贡国（第1—4组）无一例外是民主国家。无论人们如何修改前四组国家的相对排序，结果都是一样的：民主国家伙伴是最好的朝贡国。在较低的组别（第五组和第六组）中，的确有非民主的朝贡国，但它们只是少数。

总体模式显而易见：非民主国家在美国朝贡体系中不太可能排名最前。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中国朝贡体系还是美国朝贡体系，在对二流国家的排序上都非常相似。在前者中，进入内圈的条件是接近中华文明；在后者中，加入内圈的条件则是遵循自由民主的规范和实践。^①

（四）美国的礼仪

外交礼仪研究者们认为，“没有礼仪的外交是难以想象的”。^②他们也认为，如果得到反复实施，礼仪会发挥确立权威和合法化的关键作用。^③在中国朝贡体系中，最典型的礼仪是朝贡使团、叩头仪式和册封典礼（朝贡国的新统治者受邀请前来接受印章以确认其统治合法性）。这些礼仪的目的和效果是证明中国的核心地位，奠定中国在等级秩序中的首要地位，并且强化其伟大文化。对于美国来说，这些礼仪在当代有哪些类似的表现呢？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礼仪的深层含义是什么？

渴望与中国往来的外国人必须派遣朝贡使团，这表明中国朝廷的一项关键礼仪——对于外交而言——是皇帝坐在龙椅上等候“远人”前来觐

^① 这一点比较也可以从英国学派理论家们似乎喜欢用的“文明标准”一词的角度进行表达：如果中国关于谁符合文明标准的标准是接近中华文化，那么美国关于文明标准的标准就是接近美式民主。参见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② David I. Kertzer, *Rituals,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4.

^③ Catherine Bell,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Lora Viola, “Diplomatic Ritual as Power: Deliberation, Ritu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Legitimacy,” paper delivered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Chicago, February 28 to March 3, 2007.

见和进贡，之后对他们加以“怀柔”^①。在中国以外，尤其是在欧洲，外交的主要表现当然是双边谈判，领导人以及作为名义上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代表、负责彼此交往的外交官的相互来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与中国没有太大的不同。美国外交官和军官需要准备到各处访问，以保卫美国的利益。在反抗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期间，本杰明·富兰克林被派往法国以与法国结成联盟；在赢得独立之后，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84年远赴欧洲就商贸条约进行谈判。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警告喜欢冒险的欧洲人不要干涉美洲大陆的事务（“门罗宣言”）。等到成为一个强国，美国毫不害羞地开始试图征服遥远的领土（菲律宾），佩里将军和他的黑船队也抵达日本说服日本人开放通商。正如他们所说，“留下的是历史”。

然而，自1945年以来，人们感觉到华盛顿——凭借其实力和威望——是轴心，“远人”竞相来朝、呈上贡品，反过来受到“怀柔”，即接受美国的祝福和援助。外国驻华盛顿使馆展开游说，以争取自己的领导人来访。决定谁能来访实际上成了“美国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向外国领导人和公众传递出有关他们在美国人世界观中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②

一旦同意来访，外国使馆会展开工作以确保其领导人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邀赴华盛顿访问或出席峰会是一项光荣的外交政策成就。因此，外国领导人会纠结于访问规格以及相应的接待礼节。是一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还仅仅是工作访问？外国领导人是否会到访戴维营或者享受在国会发表演讲的待遇？在戴维营逗留以及在国会发表演讲主要是美国为青睐的朝贡国保留的优待。自1874年以来，在国会发

^① “怀柔远人”当然是“如《大清会典》所规定的中国皇帝应该如何对待前来朝贡的外国人的描述和命令”。这里要说的是，在远人被怀柔之前，他们需要到中国来。也可参见James Hea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pp. xi and xiii.

^② Jarol Manheim,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3.

表演讲机会最多的那些国家可以被认为是美国最喜欢的朝贡国：英国（8次）、法国（8次）、以色列（7次）、墨西哥（7次）、意大利（6次）、爱尔兰（6次）、德国（5次）、韩国（5次）、印度（4次）、加拿大（3次）、阿根廷（3次）、澳大利亚（3次）和菲律宾（3次）。^①

的确，朝贡国不仅仅是来访时能够访问华盛顿的核心国家。非朝贡国甚至是对手也需要利用国事访问的机会来缓解紧张关系、达成协议和签署协定。比如，1973年6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对这次会议的叙述值得一提，因为它支持了诸如峰会等礼仪为双方发挥了重要的合法化作用的观点：“我仍然记得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当时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站在一个特别的讲台上。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这似乎是他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刻。当苏联与美国在所有实力上——核力量、导弹和核弹头——都是平等的时候，有什么比与美国总统平等地站在一起更伟大的事情呢？甚至是灿烂的阳光似乎都在强调这个事件的重要意义。”^② 多勃雷宁的论述中披露的最令人惊讶甚至惋惜的事情是，苏联在1973年时感到有必要出现一场白宫仪式，一方面表现其与美国实现了平等，另一方面表明勃列日涅夫的最伟大胜利。对于世界其他部分来说，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不是注定与美国平等么？难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承认两个超级大国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至少在1972年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莫斯科峰会、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才取得了军事上的势均力敌？答案或许是世界还不够承认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最好的确认和合法化，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就是站在白宫南草坪的特别讲台上。这就是华盛顿的威望，尽管苏联并不是美国的朝贡国，但是它的心态——需要得到华盛顿

^① 参见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fice of the Clerk, Foreign Leaders and Dignitaries Who Have Addressed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ttp://artandhistory.house.gov/house_history/foreignleaders.aspx。

^②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 281.

(美国)的认可——与美国的朝贡国是一致的。多勃雷宁将白宫欢迎仪式描绘为对双方势均力敌的确认，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册封仪式，在这种仪式上来自二流国家的使臣希望轴心国家对其新统治者统治臣民的合法性进行正式批准。

与中国朝贡体系中的册封仪式更合适的类比可能是美国承认他国的政策。承认是册封在当代的对应：二者都意味着授予新统治者以合法性。国际体系中的新国家无一例外地寻求获得总体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强国的承认。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美国的承认被所有希望加入国际社会的新国家视为最重要的事情。1917年苏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成立，美国当时并没有承认苏联，而是在16年后的1933年才予以承认。中国等待的时间更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个月之后，美国将使馆迁到台北。如果没有爆发朝鲜战争美国是否会承认中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迪安·艾奇逊多么希望承认中国从而在中国与苏联之间打下楔子，这种希望被朝鲜战争摧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立场是，台湾就是中国，“美国不会承认其他国家”。^①30年之后的1979年，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这种承认才得以恢复。

苏联和中国的例子表明，政治意识形态是美国承认政策中的重要考量。美国拒绝承认苏联和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共产主义国家，它们的政权是通过暴力的社会革命上台的。^②因此，承认（或者撤销承认）似乎发挥了与中国朝贡体系下的册封仪式类似的功能：二者都是对二流国家的新领导人或新政府授予合法性。事实是，苏联或中国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朝贡国，这也是美国不急于承认它们的另一个原因。

与承认作为一种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可或否定的外交礼仪相关的是一项

^① 转引自 Warren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1; 也可参见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specially chapter 2.

^② 关于美国对社会革命的反感，参见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apter 4.

更近的美国礼仪：发布年度人权报告。^① 自 1975 年以来，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美国政府的人权工作也受到一系列强有力官方组织以及致力于促进人权和民主事业的非政府组织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相当于统治报告；它们会对未能遵守报告中所列权利的国家进行点名和羞辱。总体上看，这种点名和羞辱礼仪最少是“异类”的标准（它们不遵循我们所坚持的价值），最多则是“野蛮”的标准。有趣的是中国朝贡体系也是如此，在中国的体系下，“同类”的标准不是政治实践，而是接受儒家规范和方式。

（五）对朝贡国仁慈、对挑战者狠毒

只要中国的朝贡世界秩序是自愿尊重和接受儒家文化和道德标准，那么它在总体上就是仁慈的、非强制性的。不认同儒家文化优越性的外国人不需要前来朝拜或进贡。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是他们的损失。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待自己的朝贡国也是仁慈的、非强制性的。与丹尼尔·普莱特卡一样，美国的分析家和舆论家们将美国描绘为一个仁慈的霸主，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们也普遍认同这一描述。因此，与中国一样，美国很容易通过仁慈和非强制的方式与二流国家交往。

难题在于如何对待那些挑战你的人，以及那些拒绝尊重你的权力和理念的人。美国在使用武力和强制手段对待这些对手和非朝贡国时并没有犹豫不决。这些国家最终遭遇了美国的“狠毒”和强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1950 年的朝鲜和中国，猪湾事件期间的古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以及冷战时期大多数时候）的苏联以及 1991 年和 2003 年的萨达姆·侯赛因，它们显然不会认为美国是善意的。二流国家偶尔也会迷失，如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和法国未经美国允许入侵埃及。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美国会使用经济—外交强制手段让它们重新回头。不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nnual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1999 – 2011*, <http://www.state.gov/j/drl/rls/hrpt/index.htm>.

过，总体的模式是清楚的，中国也没有太大的不同：采用仁慈和非强制性手段对待朝贡国，当情况需要时愿意使用武力和强制手段对付非朝贡国。

如果不涉及美国的威望和信誉，那么我们有关美国是一个仁慈的、非强制性的轴心国家的讨论就显得不够完整。美国之所以重视自身威望和信誉，主要原因是如果其他国家——盟友和对手——相信它或者害怕它，那么美国就不太需要使用武力或强制手段来达到自己希望的结果。换言之，如果美国的威望很高，其权力的可信性很强，美国就不太需要证明这一点。挑战者不太可能发起攻击，而美国也可以采取仁慈的行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发动“有限的”战争来维持其威望，只要这些战争有助于防止更大的战争。杜鲁门和约翰逊总统分别将美国带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感到自己不得不捍卫美国的威望、维持其权力的可信性。^① 他们愿意发动有限战争是为了向更广泛的世界——既包括戴高乐将军和康拉德·阿登纳等盟友，也包括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等对手——证明美国的承诺是当真的，并且会使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其承诺。杜鲁门和约翰逊担心，如果美国不介入这些冲突，没有人会相信美国或者尊重它的权力，而且会在核时代导致更大规模的、更具毁灭性的战争。^②

（六）国内—国际联系：自由世界的领袖

朝贡体系中心国家的统治者们——世界其他部分会前来向他们表示效忠和进贡——获得了巨大的国内收益。外国人的来访、他们所接受的礼制以及他们对轴心国家方式的内化为轴心国家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统治权）提供了外部支持。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统治者们

^① 参见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George Kahin,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② 参见 Daryl Press, *Calculating Credibil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将自己视为天子和天下的主宰。因此，天下概念表明中国皇帝们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天下”的“主人”。有什么比一拨又一拨焦急的外国人来到皇帝的朝廷呈上礼物并且对他的文明和仁慈表示效忠更能确认这种神话呢？正如研究中国朝贡体系的学者们所强调的，中国皇帝赐予朝贡国的礼物的经济价值要远远超过他所接受的礼物。此外，中国还会负担二流国家前来朝贡的交通和食宿开支，数量相当庞大。^① 如果朝贡使命会给中国经济上带来如此巨大的负收益，那么维持这种关系的理由就在于它们的国内政治合法化作用以及中国从其他国家认可其地位和文化优越性中获得的心理满足。

类似的过程也适用于美国吗？对这一点则需要谨慎。对外政策总是会影响国内政治。在中国的案例中，二者的关系尤为明显，这是由于朝贡体系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天子的诏令统治“天下”。任何与这一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行为——如外国人的叩头——都会强化皇帝的国内合法性。因此，对于美国而言问题在于，是否有一种类似的意识形态将国内与国际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联系支撑着政府的国内合法性？

答案是肯定的。“自由世界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② 中国皇帝宣称是世界的统治者，当时他的实际管辖并没有扩展到东北亚和东南亚以外的地区。后世的帝王们感到满足是因为他们受到文化的约束：不值得花费功夫去统治那些无法被中国化的地区。不过，自由世界的领袖没有这样的约束：美国认为自己是那些已经获得自由以及正在寻求自由的人们的领袖。

领导自由世界首先意味着让美国变得强大，这也意味着处理好诸如失业、贫困和医保等国内挑战对于任何政府的统治正当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① Li Zhaoji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p. 55.

^② “自由世界的领袖”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主流自身描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简洁地指出了这一点：“二战以后，美国将自己界定为与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对抗的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参见“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1997, p. 30。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自我描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民主世界的领袖”能够很好地捕捉到这种变化。亨廷顿在1997年写作的文章中将二者综合在一起。

然而，应对外部挑战是国内合法性的又一关键决定因素。面对着外部世界，美国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称号。上文已经讨论过美国领导地位的话语，它是美国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常量，超越了两大政党的分歧。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回避“注定领导”的话语——外交政策机构相信这一点，而美国公众也期待这一点。^①此外，二流国家也支持或默许这样一种观点。用梅列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对美国的恰当表述来说，正是“权力优势”让它担负其领导地位。^②

但是，事实并不仅仅如此：让美国具有担当领导的独一无二资格的是它的政治信条——自由。正如新罕布什尔州的座右铭所说，“不自由，毋宁死”。强调自由（通常意味着个人自由）源于奠定美国民主制度的自由民主理念。被统治者的同意（表现为代议制政府）是至高无上的；通过一个制度性制衡体系，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其他政府形式难以实现的方式发挥着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作用。

正是“领导地位”与“自由”的结合使得国外对国内的影响显得尤为强烈。因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写道，美国维持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源于“我们的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模式……不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告诉我世界依然期待美国发挥领导作用”。^③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更加有力地宣布美国重返亚洲。他重申自己关于“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且我们会留在这里”的观点，与他的国务卿一样，奥巴马强调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正是美国在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战争使得“民主国家能够站稳脚跟”。他在演讲结束时宣称五大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和选举自由）“激荡着每个人的灵魂”，

① 参见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0) ; David Rothkopf , *Running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 2004) ; Melvyn Leffler and Jeffrey Legro , eds. , *To Lead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

② Melvyn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③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 No. 189 , 2011 , p. 63.

让“民主国家……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最高级的政府形式”。^①

确实，奥巴马总统演讲的主要对象是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听众。但是，国内听众也并不遥远。国内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不仅仅是在国内坚持民主理念，而且要在海外推广这些理念，或者至少构筑一道防止它们遭受海外反民主势力侵蚀的“防波堤”。冷战既是一场军事竞赛，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竞赛。换言之，外部挑战和危险不仅有助于刻画美国的认同，也对国内合法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②

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候，一个人是否适合执政的关键指标是说服美国公众自己有能力且有意愿领导自由世界对抗或遏制苏联。共和党被认为能够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使得民主党处于守势。据说，后者可能要为美国介入两场亚洲地区的陆地战争负部分责任——无论是杜鲁门还是约翰逊都不能被认为如果输掉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还能够作为政治领导人生存下去。当时，杜鲁门设法恢复到了交战之前的状态，尽管并没有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来解放朝鲜（并由此获得连任），而约翰逊无法赢得越战也导致他无法竞选连任。

当冷战走向终结之时，日本短暂地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美日经济摩擦以及关于日本可能“掏空”美国的关键产业的认识引发了有关“遏制”日本的讨论。^③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主要的外部“异类”。无论是比尔·克林顿还是乔治·W·布什在总统竞选期间都对中国说了不少狠话，尽管一旦赢得选举之后他们对待中国都变得更加务实。奥巴马从克林顿的过分言论中吸取了教训，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对中国的批评变得更加谨慎。4年之后，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奥巴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② 参见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③ James Fallows, “Containing Japan,” *The Atlantic*, May 1989, pp. 40–54.

马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针对中国的诉讼，理由是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获得了出口补贴，损害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利益。奥巴马面对着来自竞选对手米特·罗姆尼的压力，罗姆尼威胁一旦自己当选后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采取针对美国意识形态“异类”的强硬表现和行动是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一部分。如果在任总统及其竞选对手（在竞选期间）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会丧失国内合法性，也可能丢掉总统职位。

领导自由世界在后冷战时代也有第二个维度：扩展民主。正如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所说，扩展民主始终是一项“美国使命”。^①扩展民主的理由不仅仅在于其规范诉求，一个仁慈的美国希望将“最高级的政府形式”扩展到整个人类，它也纠结于那种认为美国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中无法获得安全的观念。因此，扩展民主也有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②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人认真对待伍德罗·威尔逊的表述——是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改造德国和日本、冷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也是如此。在这些案例中，美国认为自己是在对抗和反击极权主义所主张的与民主的生活方式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确，权力要素——维持或扩充美国的权力——在美国的决策中同样重要，但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在这些案例中通常是相互交织的。

事实上，在冷战的前二十年里，美国并没有回避对全世界的独裁者的扶植——美国决策者喜欢用我们的“混蛋儿子”这个词，只要他们在对抗苏联（以及中国）的大战中站在美国一边。尽管美国本希望在第三世界推行人权和民主，但是与苏联的竞争让美国将这些考虑搁置在一旁。当美国驻智利大使试图让皮诺切特总统保证智利遵守人权时，据报

^①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8. 这也是美国官方讲话中随处可见的主旨，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尤其如此。

道亨利·基辛格曾命令他的大使“停止政治说教”。^① 不过非常重要的是，戴维·波普（David Popper）大使被认为适合提出这一问题：他可能与基辛格的现实政治命令相抵触，但是他对皮诺切特提出的要求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灵魂。正如许多非民主国家甚至自由民主国家在冷战后所认识到的那样，扩展人权和民主的议程回到了美国外交的最前线。

关于尼克松政府过于忽视海外人权的认识使得国会坚持在国务院设立人权事务局。吉米·卡特任命前民权活动家帕特里夏·德里安（Patricia Derian）担任负责人权和人道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提升人权议程的成功尝试。更重要的是，国务院中成立人权事务局——今天被称为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使得人权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使得民主制度化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卡特之后的大多数总统都会以某种规律性推进民主和人权议程：卡特强调它，乔治·H. 布什更加克制，而克林顿政府明确主张扩展民主，部分根据是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打仗的理论。^② 在乔治·W. 布什政府有影响的新保守主义者更进一步：他们鼓吹美国的超强军事实力，宣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具有道德标准，希望颠覆约翰·亚当斯关于不要到海外挑战群魔的建议。他们的反应是，为什么不这样做呢？^③ 难道美国没有利用军事力量改造世界、培育更多民主国家的道德责任吗？

乔治·W. 布什政府对武力的过度使用导致其继任者奥巴马在推广民主上采取了低姿态的路径。与小布什政府“道德标准与武力相结合”的

^① 转引自 Lars Schoultz, *Human Rights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1.

^②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pp. 3 – 7; Michael Cox, “Wilsonianism Resurgen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in Michael Cox, G. John Ikenberry and Takashi Inoguchi,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18 – 239.

^③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4, 1996, p. 31.

路径相比，奥巴马团队更加务实和谨慎。此外，奥巴马结束了其前任开启的几场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将推广民主和人权搁置一旁。他在演讲中反复重申民主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的重要性。^① 他说过的话回过头来也令他纠结：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迫使美国放弃了胡斯尼·穆巴拉克，他是埃及的独裁领导人但也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权煽动者也是如此。在利比亚，经历了最初的犹豫不决之后，美国决定参与北约建立禁飞区的行动，敲响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丧钟。美国又回到了原地：到了21世纪，关于与美国结盟的独裁者是我们的“混蛋儿子”的说法已经不再引起美国决策者的共鸣；当反对这些独裁者的国内暴动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对民主的呼声变得难以忽视。

四 中美朝贡体系的差异

上文所作的类比强调了最终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尽管我们所作的类比推理揭示了近代中国与当代美国应对世界的方式具有的奇妙而又重要的共性，我们也有必要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对扩张的狂热程度是一个关键差异。中国似乎满足于对其“邻邦”或在亚洲行使霸权。相比之下，美国不愿仅仅做拉美的霸主（大约从“门罗宣言”开始），它希望把加拿大收入囊中，而且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试图通过强制外交和武力手段兼并夏威夷、菲律宾和萨摩亚。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一个敌对的霸主主宰欧亚大陆。的确，明朝的郑和率领300多艘舰船和28000名水手远航，向南远抵非洲，但是他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朝贡国的巨大扩张。^②

^①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 Cairo, Egypt, June 4,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_by_the_President_at_Cairo_University_6-04-09.

^② Li Zhaoji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p.52 “Zheng He: Admiral, Legend, and Manager,” *The Straits Times*, February 1, 2012, http://www.straitstimes.com/print/Think/Story/STIStory_765658.html.

尽管超凡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中国成为东亚霸主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在中国应对其朝贡国时并未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主要通过贸易和文明魅力吸引朝贡国：韩国等邻邦渴望与中国开展贸易，也受到了儒家文化吸引。体系的核心及其维持的方式是观念性的：中华文化受到外邦国际化和内化。只要它们认可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它们就自愿希望成为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并且赞成其价值观。

不过，美国复制和维持朝贡体系的方式既有观念的也有物质的，后者至少与前者一样重要。将美国的朝贡体系维系在一起的观念力量当然是民主制度、个人自由以及市场经济。民主与自由在上文中已经有所讨论，因此这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上。自建国之初，美国在经济组织上就围绕市场资本主义展开，在这一模式中，国家在提供了基本安排之后将制造、购买、销售等职能转移给了个人或私人企业。这也是人们所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经济模式中，自由市场是自由民主制度运转的组成部分：个人在国家的最少干预下进行交易的自由得到了民主国家强调个人自由的补充和强化。这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截然相反，在后者中，国家在经济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高度的国家控制是计划经济体缺乏个人自由的主要原因。

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对外维度：经济扩张。分析家们用“门户开放”一词来描绘美国在海外以扩展和强化“个人主义、私人财产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开展贸易和投资的强烈偏好。^①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指出了美国的经济意识形态、安全与经济扩展之间的观念：“门户开放模糊了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界限，因为美国的核心价值的安全被认为不仅与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有关，而且更多地与海外经济扩张以及外部世界对美国自由意识形态的开放性联系在一起……经济扩张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展齐头并进。”^②

①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 9.

②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3.

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依靠一系列广泛的现有制度——其中许多是出于工具性目的建立的——来支持、扩展和捍卫美国的理念。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经济理念和政策——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开放市场、人类发展、汇率以及条件性——都反映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偏好。这些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人们贴切地称为“华盛顿共识”。希望在与富裕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进行贸易时享受优惠待遇或者需要发展基金或紧急援助的国家必须遵循这些制度所设定的游戏规则。

对于世界其他部分而言，最为明显的是美国投射其军事力量的兴趣和能力。由于拥有驻扎或转移军队和航母的庞大基地网络，美国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是中国在其朝贡体系如日中天之时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这些基地的存在通常为那些论述美国帝国的人所强调；基地被视为美国的全球触角或过度扩张的表现。^① 另一方面，美国的海军指挥官喜欢谈论“72小时原则”，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如此众多的基地，美军可以在72小时内抵达任何地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成这一壮举。^② 这种力量投射能力是美国实现其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保护其盟友和伙伴）的工具箱中的核心要素。

与上述两点相关，最后一点差异在于体系的相对成功程度。中国朝贡体系从维持时间的角度看是极其成功的，从汉代开始到19世纪中期维持了1800多年。它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了东北亚和平（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从这一点看它也是成功的，即使实践有时候与理论相抵触，因为中国在其虚弱时需要放宽其有关等级和优势的假设。^③ 美国朝贡体系的寿

^①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especially chapter 6; 也可参见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②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What Impact Would the Loss of Overseas Bases Have on U.S. Power Projection?” Global Security Forum, 2010, transcript, 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00513_bases_transcript.pdf.

^③ 这类行为可参见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3 – 55; Zhang Feng, “Rethinking the ‘Tribute System’,” pp. 555, 561 – 565; Li Zhaoji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p. 55.

命才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如果从 1898 年开始算起），因此按照维持时间的标准来判断其成功显得为时尚早。它也维持了自身及其朝贡国之间的和平，尽管美国也对非朝贡国发动了威胁到自身及其朝贡国的战争。表 3 根据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标准对两个朝贡体系的表现进行了比较，这些标准包括统治的范围/程度、经济收益、接受程度和效仿程度等。评估结果表明，美国朝贡体系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

表 3 中美朝贡体系的成就比较

	中 国	美 国
运行时间	473 年*	115 年
地理范围	东亚	全球
政治—文化影响	东亚	全球
经济收益/损失	净损失 **	净收益
政治收益/损失	地区和平(明清时期) 加强国内合法性	自 1945 年以来没有爆发霸权战争加强国内合法性
军事—安全收益/损失	19 世纪 40 年代战败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没有对手

注：* 如果将中国朝贡体系的起点追溯到汉朝，其运行时间可能将近 1850 年；本文关注的是这一体系在明清两代的运行，这意味着最相关的数字是从明朝立国（1368 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1 年）。

** 对于皇帝的朝廷而言。

五 朝贡国的自我认识和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是美国的自我认识、行动和期待，试图表明自 1898 年以来美国的思想和行为与中国朝贡体系的关键假设和外交实践具有的相似之处。美国的朝贡国的自我认识和行为又是怎样的呢？很少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会认为自己是二流国家或朝贡国，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这一部分是因为它们缺乏从这种角度认识自己的词汇。美国例外论话语的主导使得诸如“美国是朝贡体系中心”等其他话语会被认为是异类，在概念上超越了美国及其朝贡国可以理解的范畴。

二流国家或朝贡国以这种方式思考自身对于朝贡体系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么？笔者认为不是。框架或模型是学者们用来简化和组织复杂关系以便厘清所研究现象的本质关系的分析工具。^① 朝贡框架有助于我们从这一分析范畴理解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行为。正如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一辈子都在作诗自己却不知道一样，美国的朝贡国也会表现出自己不知道的朝贡国行为。它们的行为的两个方面表明了这一点：一是它们用来描述自身与美国关系的词汇，二是它们为美国或遵从其命令所做的事情。

如果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不认为自己是朝贡国，它们偏爱使用哪些词汇？通常是朋友、盟友和伙伴。这些词汇捕捉到双方关系的重要内容，然而它们也显示出一种通常并不存在的平等性。比如，美国决策者们喜欢用“辐辏”（hub – and – spokes）比喻来描绘美国及其东亚盟国之间的战略联系，这种说法更能说明问题。有趣的是，美国的大多数东亚军事盟友似乎都对这种表述感到满意。乍看起来，这一机械类比很好地描绘了美国的核心地位（辐）及其与亚洲盟友（辏）之间的联系，而且并不具有不恰当的规范意涵。不过，如果做更进一步考察，“辐辏”比喻远未规避朝贡视角所强调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中心或辐（辏经由它向边缘辐射）的说法意味着资源和指令从辐流向辏，因此也意味着等级（朝贡国可能会称其为领导）和不平等。

另外两种经常使用的话语也值得注意：二流国家呼吁美国在世界或其所在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以及请求美国在其所在地区扮演“制衡”角色

^① 比如，约翰·加迪斯关于美国遏制战略的对称性—非对称性模型之所以令人信服，并不在于历届美国政府是否从这些角度来思考它们的战略。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没有用“对称性”或“非对称性”等概念来表述其政策，但是他们也许会意识到，他们（民主党人）要么倾向于用对等的反措施来面对苏联侦探（对称性），要么选择性地（共和党人）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作出回应（非对称性）。参见 John L.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同样，阐明大卫·西尔万（David Sylvan）和斯蒂芬·马耶斯基（Stephen Majeski）在《美国外交政策视角》一书中提出的庇护—扈从模型并不取决于美国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保护国以及其他国家是否认为自己是被保护国。这一模型令人信服之处在于相关方的行为是否符合模型所规定的方式：如果它叫起来像鸭子，走起来也像鸭子，那它就是一只鸭子！

(尤其是东亚国家)。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美国具有无以匹敌的军事和经济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美国的朝贡国不仅承认而且呼唤美国的领导地位，它们的做法完全与朝贡国一样：承认等级和不平等，听命于轴心。同样，一些东亚国家试图从“返回这个地区以平衡崛起大国”的角度来描绘当前美国“转向”东亚或再平衡，这也显示出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强烈偏好。“平衡崛起大国”的需要似乎成为美国的正式和非正式盟友的主流话语或解读。^① 这要么是对东亚权力方程的误解，要么是维持和巩固美国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从均势的角度看)。^②

那么，在话语方面，有证据表明美国盟国是这么说的，但它们也是这么做的么？有证据表明美国的朝贡国采取了轴心国家所期待的政策么？换言之，在20世纪和21世纪，效忠和进贡意味着什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朝贡国需要向中心国家呈献大象、马匹和珍珠。美国希望从二流国家获得的首要贡品是承认美国霸权。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美国的盟友在言语行为层次已经毫无保留地给予了这种承认。

在政策层次，二流国家承认美国霸权的最有力证据是它们不挑战美国(反而号召其承担领导地位)，并且大体上愿意遵循美国所制定的游戏规则。^③ 在安全方面，它们乐于成为美国的正式军事盟友或“战略伙伴”。作为盟友或伙伴，它们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由此让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力量投射。在经济方面，它们甘愿按照美国所设定的规则进行贸

^① 比如可参见 Pavin Chachavalpongpun, “ASEAN at 45: Still Unsettled over China,”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10, 2012, p. A25。这篇文章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旨在“反制”和保持“力量对比真正平衡”。

^② 这个问题上的学术共识显而易见：美国是东亚的霸主。参见 Peter Van Ness, “Hegemony, Not Anarchy: Why China and Japan are Not Balancing US Unipolar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2, No. 1, 2002, pp. 131 – 150; Mark Beeson and Mark Berger, “The Paradoxes of Paramountcy: Regional Rival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East Asia,” *Global Change*, Vol. 15, No. 1, 2003, pp. 27 – 42; Evelyn Goh, “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pp. 353 – 377。

^③ 此处所描述的政策行为与吴翠玲(Evelyn Goh)所发现的“等级顺从”行为有某些相似之处，参见 Evelyn Goh, “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p. 359。

易，愿意加入美国所设立和领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它们并没有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它们遵守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它们也没有想要废黜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即便这些制度和规则对于它们而言并非没有代价。^①

除此之外，朝贡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倾向于与美国保持一致。因此，如果有人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他会发现那些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国家很少会与美国的投票不一致。一项关于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行为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冷战时期的大多数东西方冲突延续到了后冷战时代。”^②也就是说，美国大体上可以继续信赖其盟友，联合它们一致投票。当然，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二流国家做得更多。在1945年以后美国所卷入的四场大的国家间战争中，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和泰国等国至少有两次与美国并肩而战。尽管二流国家可能出于正当的国家安全理由在这些战争中加入美国一方，它们也可以说是通过派遣军队加入美国的战争来向中心国家进献终极贡品。比如，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承诺英国会加入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自由伊拉克”行动，尽管他面对来自内阁内部以及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不过，美国非常感激这一承诺。加拿大曾参加1990—1991年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但缺席了2003年的战争，导致美加关系明显转向冷淡。^③

美国希望二流国家进献的第二项贡品是效仿其政治理念和形态，即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点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而言当然不是什么问题，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美国的最紧密盟友。正如表2所示，所有排名靠前的朝贡国都是民主国家。尽管美国的五大盟友（排序第1和第2位的国家）中有四个是民主国家，但排序第4—6的国家中有一些直到20世纪70年代、

^① 最近的分析可参见Carla Norrlöf, *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Erik Voeten, “Clashes in the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2000, p. 213.

^③ John J. Noble, “Canada-US Relations in the Post-Iraq-War Era: Stop the Drift toward Irrelevance,” *Policy Options*, May 2003, p. 19.

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才成为民主国家。表2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就可以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在一些案例中，美国积极地推广民主（韩国、西班牙、希腊和菲律宾），不过在另一些案例中，美国的作用极小。因此，我们并不能说二流国家接受民主理念和形态是对美国要求的回应：这仅仅适用于一些案例。重要的是，它们最终都变成了民主国家。

根据定义，民主是一种向构成美国认同内核的政治理念和形态表示效忠的贡品。这种效忠与中国的内层朝贡国内化儒家价值观的行为一样强烈。中国常常有信心认为，其最文明的朝贡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觉悟。美国也没有什么不同，它同样有信心认为，其最文明的朝贡国如果还不是民主国家，也会希望成为民主国家，这并不必然是为了提升其在美国朝贡等级中的位置，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实现它们应该实现的政治自由。事实上，美国比中国做得更好：它相信自己的政治模式即便对于非朝贡国也是适用的，并且愿意提供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帮助以推动它们向民主国家转型。^①

上文所述表明，美国通过劝诱、强迫等方式从二流国家那里获得了比历史上的中国更多的贡品。确实，我们的起点很低。作为向中国进贡的回报，据说中国朝廷在经济上给二流国家提供了比自己所获得的更多的好处。除了和平与稳定，令中国统治者感到满足的主要是心理上的：其他国家承认其霸权和文化优越性而获得的自我肯定以及权力—威望感。美国也获得了深层的心理满足：同样的肯定和权力感，但这个案例中是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感。不过，就美国而言，除了心理上的满足，它（包括其跨国企业等商业机构）也在贸易和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美国所设定的规则进行的。的确，这种受益并不是单方面的：美国的朝贡国（与中国的一样）也从中受益，正如美国在欧洲、亚洲和拉美的朝贡国所获得的经济和安全收益所表明的那样。

^① Thomas Carothers, *Aiding Democracy Abroad*.

六 结语

朝贡框架的新颖性并不在于对美国霸权的质疑和驳斥，而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从规范角度对霸权提出反驳，赋予霸权不那么正面的色彩，强调关系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描绘霸权，强调领导、提供公益以及稳定。^① 相比之下，朝贡体系的思想揭示了这个词汇本身所包含的不平等关系。中国将这种不平等性发展到极致，用礼制加以确认。然而，可以理解，美国表现得更加矛盾：不平等反映在对美国超强地位认可的渴望之中，这似乎与这个国家在《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所有人生而平等”的自我理解不一致。

换言之，朝贡思想强调了霸权概念试图掩盖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哪个概念更适于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评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等级概念本身带有贬义，似乎与“主权平等”思想相悖，但它对国际关系具有稳定作用。霸权稳定论认为，通过提供二流国家无力或不愿分担的公益，霸权国在塑造经济和安全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② 显然，霸权国也收获了各种各样的巨大好处。^③ 康灿雄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霸权给地区带来了五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④ 威廉·沃尔福思指出，美国单极可能还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而且也会有益于和平与稳定。^⑤ 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欢迎美国霸权在该

^① 参见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especially chapter 5, “On American hegemony, public goods, self-restraint, and order”。

^②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especially chapter 5, “On American hegemony, public goods, self-restraint, and order”.

^③ Carla Norrlöf, *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especially chapter 5.

^④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pp. 8 – 10.

^⑤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 7 – 8.

地区存在的人们可能也会支持“霸权有益于和平与稳定”的思想而非均势原则。

其次，朝贡思想关注的是“朝贡”这一概念。如果你承认我的主导地位，当我们相遇以及我们相隔遥远时，你应该做些什么？中国的答案是：让我来决定你能否来访（以及多么频繁），前来朝贡时向皇帝叩头，让我来赋予你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最终在你回到国内后效仿我们的文化形态。那些进入这一体系的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和安全收益。将美国视为朝贡体系的轴心提供了类似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可以从朝贡国那里得到哪些东西：通过不与之对抗和为其提供军事基地来承认美国的超强权力，在经济博弈中遵循美国的规则，效仿美国的政治理念和形态。二流国家获得的经济和安全收益不亚于中国的主要朝贡国所享有的好处。

最后，将美国视为一个朝贡体系的缔造者有助于我们将构成美国外交景象的许多有趣而又不同的部分联系在一起：霸权国、自由世界的领袖、民主（推广）、威望/地位以及信誉。这些自我理解和关切被认为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然而并没有一种表述将它们紧密联系起来。朝贡思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将这些要素视为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需要合法化话语来为等级和不平等进行辩护，强调公益供给的既有文献忽视了政治要素：民主和（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合法化话语真正具有特色之处在于二者的融合：正如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一表述所表明的，民主与美国领导地位结合在一起。这一表述赋予了美国道德地位、威望和信誉，而这些是维持朝贡体系的关键要素。当中心国家被认为在这些品质上的表现无与伦比时，朝贡国就希望靠近中心国家以寻求保护（并且通过加入获得威望），而对手在进行挑衅之前也会三思。只有认识到美国如何认真对待这种领导地位，我们才能够理解威望和信誉为何会成为必须加以维护的核心关切。

在冷战即将走向终结之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将1945至1989年描绘为“长和

平”时期。加迪斯写道，“变换名称就会改变一切”。^① 他的意思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冷战”（传递出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消极理解）或许让我们无法看清积极的事态发展。相反，将其视为“长和平”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及维护那些维持和平的因素。本文试图引入一个新的词汇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它的突出贡献是将（中国的）朝贡思想作为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框架并且将二者进行对比。

本文开篇指出，美国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具有不为人们所承认的相似之处。或许在结论部分论述二者为人们所低估的差异更为合适。在对中华世界秩序及其如何在西方压力面前土崩瓦解的精彩分析中，张勇进指出语汇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在 19 世纪中期所面临的困局：中国关于自身的世界地位从“天下”缩小为“国家”，即“中华世界变成了世界中的中国”。^② 从朝贡的角度观察美国外交的长时段，人们对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美国对外政策轨迹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美国的世界地位似乎从“国家”转变为“天下”。迄今为止，大多数人描述这种轨迹和状态的词汇是“美国主导的和平”。这是不是美国朝贡体系的一种委婉表述呢？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刘若楠 译）

^① 加迪斯引用了历史学家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tton）的观点。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52。

^②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1.

表 2A 与美国接近的指标(进贡国和非进贡国)

国家/地区	KOREA	VIETNAM	GULF WAR	IRAQ	TROOPS BASES	CONGRESS	FAVOUR FRIEND	VISA	WTO	ALLIES	MNNA	OECD	INTEL	TOTAL	POLITY
阿富汗					X					X				2	-7
阿尔巴尼亚				X				X	X				X	2	9
阿根廷		X			X			X	X					4	8
澳大利亚	X	X	X	X	X		X	X	X				X	12	10
奥地利								X	X				X	3	10
巴林				X					X						
比利时	X							X	X					3	-8
伯利兹									X	X					n/a
玻利维亚									X	X					
巴西									X	X					2
文莱								X	X						2
保加利亚								X	X						n/a
加拿大	X		X		X			X	X						
中国									X	X					
智利					X			X	X					1	-7
哥伦比亚	X							X	X					4	10
克罗地亚									X	X					3
捷克共和国								X	X						7
丹麦					X			X	X						9
吉布提									X						8
多米尼克共和国									X	X					2
														2	8

续表

国家/地区	KOREA	VIETNAM	GULF WAR	IRAQ	TROOPS	BASES	CONGRESS	FAVOUR	FRIEND	VISA	WTO	ALLIES	MNNA	OECD	INTEL	TOTAL	POLITY
厄瓜多尔					X					X						3	5
埃及					X					X		X			X	4	-2
萨尔瓦多										X	X					2	8
爱沙尼亚										X	X			X	X	4	9
埃塞俄比亚	X										X					2	1
芬兰										X	X				X	3	10
法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0	9
德国					X	X	X	X	X	X	X	X	X	X	X	8	10
希腊	X				X	X				X	X	X	X	X	X	7	10
危地马拉										X	X					2	8
海地											X	X				2	5
洪都拉斯											X	X				2	7
匈牙利										X	X					5	10
冰岛			X	X						X	X					n/a	
印度					X		X		X						X	4	9
印度尼西亚					X					X						2	8
伊拉克						X					X					2	3
爱尔兰							X		X			X			X	4	10
以色列							X	X		X		X	X		X	6	10
意大利							X	X		X	X		X	X		8	10
牙买加											X	X				2	9
日本					X	X			X	X	X		X	X		6	10

续表

国家/地区	KOREA	VIETNAM	GULF WAR	IRAQ	TROOPS	BASES	CONGRESS	FAVOUR	FRIEND	VISA	WTO	ALLIES	MNNA	OECD	INTEL	TOTAL	POLITY
约旦					X					X		X		X		4	-3
科威特		X								X		X		X		4	-7
老挝	X					X				X		X		X		1	-7
拉脱维亚										X	X	X		X		5	8
立陶宛										X	X	X		X		4	10
卢森堡	X					X				X	X	X		X		7	n/a
马来西亚										X						1	6
马耳他										X	X					2	n/a
墨西哥						X				X	X	X		X		5	8
摩洛哥					X					X		X		X		4	-4
荷兰	X				X					X	X	X		X		8	10
新西兰	X	X								X	X	X		X		7	10
尼加拉瓜										X	X	X				2	9
挪威										X	X	X		X		5	10
巴基斯坦										X	X	X		X		4	6
巴拿马			X	X						X	X	X				3	9
巴拉圭										X	X					2	8
秘鲁			X							X	X					3	9
菲律宾	X	X			X					X	X	X		X		5	8
波兰				X						X	X	X		X		5	10
葡萄牙					X					X	X	X		X		6	10
卡塔尔					X					X						2	-10

续表

国家/地区	KOREA	VIETNAM	GULF WAR	IRAQ TROOPS	BASES	CONGRESS	FAVOUR	FRIEND	VISA	WTO	ALLIES	MNNA	OECD	INTEL	TOTAL	POLITY	
罗马尼 亚					X				X	X				X	4	9	
俄 罗 斯				X	X	X	X	X	X						4	4	
沙特阿拉伯			X							X				X	3	-10	
新 加 坡				X				X	X						3	-2	
斯 洛 伐 克								X	X					X	5	10	
斯 洛 文 尼 亚								X	X					X	5	10	
南 非	X				X			X	X						4	9	
韩 国	X	X	X	X	X	X	X	X	X						10	8	
西班牙			X	X	X			X	X					X	8	10	
瑞 典								X	X					X	3	10	
瑞 士									X	X					X	3	10
台 湾 地 区			X						X	X						3	10
泰 国	X	X		X					X	X						5	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X	X						2	10
突 尼 斯										X						1	-4
土 耳 其	X		X	X						X				X	6	9	
阿 联 酋				X						X					2	-8	
乌 克 兰			X		X					X					3	6	
英 国	X		X	X	X	X	X	X	X					X	11	10	
乌 拉 兹										X	X				2	10	
委 内 瑞 拉										X	X				2	-3	

表 2B 对指标和来源的描述

变量	描述	指标	来源	相关链接
STATE	西尔万和马耶斯基所列举的“扈从国”(除去得分为 1 或小于 1 的小国)以及没有列举的但总得分大于 2 的国家。	Sylvan, D. and Majeski, S., U.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Clients, Enemies and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4 – 36	Sylvan, D. and Majeski, S., U.S.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Clients, Enemies and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4 – 36	—
KOREA	在美国进行朝鲜战争时派遣军队	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持	Correlates of War Inter – State War Database; Citation: Sarkées, Meredith Reid and Frank Wayman, <i>Resort to War: 1816 – 2007</i> (CQ Press, 2010)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WithData_NEW/Inter-StateWarData_v4_0.csv
VIETNAM	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时派遣军队	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持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base; Citation: Sarkées, Meredith Reid and Frank Wayman, <i>Resort to War: 1816 – 2007</i> (CQ Press, 2010)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WithData_NEW/Inter-StateWarData_v4_0.csv
GULF WAR	在美国进行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派遣军队	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持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base; Citation: Sarkées, Meredith Reid and Frank Wayman, <i>Resort to War: 1816 – 2007</i> (CQ Press, 2010)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WithData_NEW/Inter-StateWarData_v4_0.csv
IRAQ	在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时派遣军队	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持	Correlates of War Inter-State War Database; Citation: Sarkées, Meredith Reid and Frank Wayman, <i>Resort to War: 1816 – 2007</i> (CQ Press, 2010)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COW2%20Data/WithData_NEW/Inter-StateWarData_v4_0.csv
TROOPS	截至 2008 年国境内部署有美国部队	美国的军事存在	Kane, T., "Global U. S. Troop Deployment, 1950 – 2005," <i>Report of the Heritage Center for Data Analysis</i> , 2006	http://s3.amazonaws.com/thf-media/2006/pdf/cda06 - 02_.pdf
BASES	截至 2009 年国境内有美国基地(没有异议的)	美国的军事存在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Baseline Report, 2009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09Baseline.pdf
CONGRESS	1990 年以来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 上发表演说的国家/政府首脑	获得美国高规格的礼遇	Office of the Clerk,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ttp://artandhistory.house.gov/house_history/foreignleaders.aspx

续表

变量	描述	指标	来源	链接
FAVOUR	截至2011年美国主流民意对该国持积极态度	美国国内的支持	Gallup Poll	http://www.gallup.com/poll/File/146096/Am_Views_Different_Countries_Feb_11_2011.pdf
FRIEND	2005列为“最亲密朋友和盟友”的国家,且到2005年美国民意支持率大于1%	美国国内的支持	Ipsos-Reid Survey of Canadians and Americans, 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http://www.ropercenter.uconn.edu/data_access/iploll/iploll.html
VISA	加入美国国土安全局“免签证计划”	信任/特殊优待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ebsite	https://esta.cbp.dhs.gov/esta/WebHelp/ESTA_Screen_Level_Online_Help_1.htm#WP3
WTO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	贸易伙伴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ebsite	http://www.wto.org/english/tradewto_e/acc_e.htm
ALLIES	美国的正式盟国	联盟承诺	Respective alliance websites	http://www.upenn.edu/research-services/exportcontrols/pages/list-countries.htm
MNNA	被美国认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国”	强化军事同盟	Database of Export Control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ttp://www.oecd.org/general/listofedmembercountries--ratificationoftheconventionontheoecd.htm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	经济联系	OECD website	Reverson, D. S., "Old Allies, New Friends: Intelligence Sharing In the War on Terror," <i>Orbis</i>, Vol. 50, No. 3, 2006, pp. 453–468
INTEL	与美国有情报共享机制的国家	战略信任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er/inser.htm
POLITY	政体项目标准下的民主排序。不含在排名中,但在结果中用星号标注	政权类型	Polity IV Dataset	

作 者 简 介

谢晓光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电子信箱: xxg1972@126. com

岳 鹏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1 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yuep05@126. com

邝云峰 (Yuen Foong Khong) 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院教授、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

电子信箱: yuenfoong.khong@nuffield.ox.ac.uk

苗中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zhongquan100@126. com

赵 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dearjxc@163. com

迟 永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chiyong1212@gmail.com